

# 底层叙事的困惑与民族作家底层书写的启示

——以广西作家周末的小说为例

潘文峰

**内容提要：** 底层叙事不应被各种理论所捆绑，其价值和意义取决于底层叙事“本身”。一些民族作家的底层书写底蕴厚实，真实展现了民族文化心理在物质文明冲击下进退失据所带来的迷惘和痛苦，尤其是底层在人生边上、在人性边缘上的挣扎。这为新世纪以来底层叙事的深化提供了另一种维度。

**关键词：** 底层叙事 困惑 深化 民族文化心理

底层无疑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这种存在在某个历史时期显得“微不足道”，势单力薄，但作为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它必然构成历史本质的一个方面。当然，这种本质不会深刻地自动地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很多时候，文学作品可以很好地帮助世人更深刻地省察自己在历史过程中深层意识的变化，观察世界的残酷性以及各种复杂的关系。因而，强调“文学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并不过时，尤其在当代。改革开放启动后短短的三十年，中国阶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千万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出现了巨大的位移。改革改变乃至摧毁了原先的社会心理，其中，底层酸楚的、坎坷的人生历程及其心理变迁尤引人关注。文学以它特有的方式映照出了时代的变迁，记录了人心在各种历史考验关头的困惑、无奈及痛苦。20世纪八九十年代，莫言、贾平凹、刘恒、刘醒龙、关仁山等作家都曾在文学作品中把乡村人生演绎得荡气回肠。2005年前后，有关底层和底层的叙事以它的尖锐性再次引起文坛的震动。

然而近几年来，底层叙事在理论上遭遇了两个较大的困惑：一是底层言说的有无可能性。有理论认为，不管言说的主体是作为代言的知识分子还是来自底层本身，其言说都不可能呈现出圆满的状态，不可能完全地反映出底层的原生态。不言而喻，作为代言的知识分子在书写过程中构筑其视角和言说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选择，选择也就意味着筛选和遗漏。而底层的自我言说，其本身也充满了各种悬疑：底层具备认清自身的状况和充分表达他所要

表达的能力吗?二是底层言说的尴尬处境——在消费的时代,底层的言说一旦呈现就有可能被各种社会力量所消费和消解,演变成一种发泄途径,起到了“建构和谐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抹平’”作用<sup>①</sup>,因而,底层言说的核心意义(公平公正的诉求、人道主义与社会批判)被大大地削弱了。

回看新世纪以来的底层叙事,近几年明显呈现出疲态之势。有论者就此深刻地指出妨碍底层叙事深化发展的几大因素:除了对苦难的过分渲染堆积、人物性格简单化、故事结构模式化的倾向以外,“底层叙事”没能真正提升自身艺术水准的更大原因是“缺乏精神资源的支撑”,应从“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现代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汲取养分。<sup>②</sup>但在我看来,仅靠思想和理论仍不足以改变底层叙事的困境——人物性格的简单化、故事结构的模式化、情节的雷同化等。其实,现实生活中的每个底层心灵世界皆广袤而复杂,并隐含地域的思想文化特征,如果仅仅投去人道主义目光或批判性眼光,仅停留在革命英雄主义或某种意识形态的层面上,那么我们或许不仅难以突破几十年来已固化了的底层叙事——阶层对立的讲述或“揭出病苦、引以疗救”的启蒙建构等模式,还难以刺破这些模式背后隐藏着的不易令人觉察的“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和“虚幻性”,于是也就难以把捉和解开当今底层在传统与现代、民族文化心理与城市的多元和开放、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撞击中形成的多重的心灵扭结。因而,底层叙事艺术水准的提升虽与作家的思想与理论密不可分,但有一点也非常关键:作家以怎样的姿态去面对他的现实对象,如何更好地把握和表现对象的立体的思想性格与灵魂。

当然,底层叙事不可能回避意识形态。书写底层生活,势必包含作家对城乡差距、贫富分化、阶层差异等现象的态度。但如果这种态度不上升为“美学的意识形态”,那么,小说创作往往忽视了现实生活和复杂的文化心理。仅靠某种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小说,不仅显得僵硬与苍白,而且其中的人物也会成了缺失灵魂的“会行走图式”,借用阿尔都塞的话来形容这一状况:“意识形态成了个人与其实际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sup>③</sup>这正是近十年来不少底层叙事流入观念化和程式化的一个根源。

如果不把底层叙事限定在狭窄的范围,“底层文学”的理论批评不怀有偏见,那么,我们应该看到近些年来一些民族作家的底层书写经验是有助于底层叙事的发展与深化的。<sup>④</sup>他们的小说不仅在政治经济层面上真切呈现底层生活的困境,还着力在文化、道德、风俗人情等层面上探索底层人物的多层次的精神世界,从而具有相当厚实的生活底蕴和艺术丰韵,如新

① 参见李亚妮《底层叙事:言说的理路与歧途》,《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6期。

② 参见赵学勇、梁波《新世纪:“底层叙事”的流变与省思》,《学术月刊》2011年10月号。

③ [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52页。

④ 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不足便是忽视了对民族作家底层书写经验的探讨与总结。

疆的刘亮程、西藏的尼玛潘多、广西的周末等人的创作便是如此。

就广西青年作家周末而言,其两个方面的底层书写经验有助于深化和丰富底层叙事。一、意识形态自觉和审美自觉的结合;二、立体探索底层的文化心理,透过文化心理活动、变化与灵魂的挣扎深刻反映处于巨大变动中的当代中国,小说中的地方性因素(或民族性因素)与当代性得到了很好的融合。这两个方面在周末的创作中是密不可分、互为因果的。

“意识形态浸透一切人类活动,它和人类存在的‘体验’本身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在伟大小说里让我们‘看到’的意识形态的形式,以个人的‘体验’作为它的内容。这个‘体验’不是一个给定的值,不是由某个纯粹的‘现实’所给定的,而是意识形态在其现实事物的特有关系中自发产生的‘体验’。”<sup>①</sup>也就是说,一个作家不管他是否意识到意识形态的存在,意识形态总是潜在地影响他的创作,底层叙事尤为如此。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强烈的意识形态往往会抑制乃至损害了审美的自觉,因此应时刻保持警惕。在底层书写的过程中,来自底层的周末对底层有足够的理解和同情,但他不是在意识形态的“虚幻”之中(即违背现实生活的逻辑)虚构尖锐的生活矛盾和宣泄情感,而是执着于认识现实生命的所有隐秘,清醒而深刻地透视人性,并把审视他者与自我叩问勾连起来,从而获得“深刻而丰富”的底层体验,真实地触摸到遭受压抑的有声或无声的历史内容——叛逆的声音、顺从的灵魂、谦卑的姿态、深层的欲望及各种社会无意识。对于自己的创作历程,周末做了这样一番总结:

开始的时候,我热衷于去观察、体察他人的生活和故事。当得到一个可以写成小说的素材,会非常兴奋,不断揣摩、加以虚构演化,直至成为一个小说。这种认识持续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作品是发表了,但感觉到层次还是上不去。开始反思,他者的故事,因为没有自己的内心,总是流于外表,叙事上即便足够顺畅,但仍然没有触及人物深层次的东西……

面对一个农民的艰辛,在写作上我可以给予他足够的同情和理解。但那点儿所谓的痛苦是农民自身的痛苦。我甚至还可以在道义上给予他足够的关怀和解脱,但实际上我从来没有敢于直面自己内心的痛苦和弱点。

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应该直面自己的痛苦和弱点,敢于拷问自己,从这个方向生发出来的作品,才是真实的和具有文学性的。一个总是写他者故事的作家,必然在创作上走入枯竭之境,因为他忽视了内心。而一个不断拷问自己内心的作者,他

① [法]L·阿尔都塞:《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董学文、荣伟编《现代美学新维度——“马克思主义”美学论文精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61页。

可能会越走越宽广。因为他在不断拷问自己的时候,深刻地认识了人作为生命的所有隐秘,也准确地认识了他人,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充实和完善了自己的内心。<sup>①</sup>

在周末看来,创作应是主体灵魂融入其中,与对象进行生命的对话和交流的过程,在体认对象的生命历程和内心的丰富情感的同时,也进行自我观照、自我拷问和自我丰富。这近似于巴金的创作观——“一同生活说”:与人物一同生活,他哭我也哭,他笑我也笑,将个人的感情消溶在大众的感情里,将个人的苦乐联系在群众的苦乐上。<sup>②</sup>但周末更注重人性的解剖:“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人会成为是一个好人,甚至能成为一个圣人,这样的人对自己和他人是有益的,是受到欢迎的。但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写作者,也许永远无法写透生命背后隐藏的丰茂的人性秘密。持‘人之初,性本恶’观点的写作者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好人,正是这种透切的认识,使他能深刻地理解和接纳人性中恶的部分,使作品中所有的人物,伟大者、渺小者、罪恶者获得同样的关照,这才是一种最大的善。”<sup>③</sup>

可以说,周末的意识形态的自觉和审美的自觉,就是对意识形态可能衍生廉价轰动效应的一种警惕,就是力图在获得深刻、丰富体验的基础上把捉和表现每一个底层人物内在的、本质的、独特的思想性格。

警惕意识形态的“虚幻性”和审美上的自觉,使周末在创作中从容地从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观察底层对自身、对他人、对社会的态度,很好地呈现了底层多重的文化心理。而这种立体性的探索也让其底层叙事获得了艺术上的升华。周末近几年的创作触及了底层若干个重大问题,如描写进城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生存尴尬与生存苦难的《还魂记》(《芙蓉》2013.1)、下岗工人的生活困境与体制性腐败的《擦鞋的女人》(《广西文学》2008.1)、弱势女性群体坎坷命运的《雪越来越暖》(《民族文学》2009.11)和《温泉宾馆》(《鸭绿江》2008.2)等。当前,这类题材的小说只要与某种意识形态翩然起舞,写得残酷和血腥一些,写得夸张和刺激一些,极容易博得众人眼球和媒介热评。但周末不然,他依然坚守自己的文学信念:“一篇好的小说必需要对生活进行深度的开掘,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对自己的内心进行深度的开掘。”<sup>④</sup>周末以上的这些底层叙事便是紧紧围绕文学的特质性内容——人性与活的灵魂进行探索和

① 周末:《小说三思》,参见周末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795dab01015keq.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795dab01015keq.html),2012-08-07。此文大部分内容见于周末小说集《飞入天中的梯田》“后记”,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97~298页。

② 参见袁振声《论巴金的文艺观》,《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

③ 周末:《飞入天中的梯田》“后记”,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98页。

④ 周末:《向生活的深处开掘》,《广西文学》2006年第1期。

刻画,真切展现社会变革中的底层文化心理以及在现代物质文明冲击下这种心理进退失据所带来的迷惘和痛苦,尤其是底层在人生边上、在人性边缘上的挣扎。

《还魂记》塑造了一个在时代物欲中挣扎的农民工形象——安叔。安叔为了让儿子上市重点高中(需交赞助费1万元),在建筑队发工资的日子趁同乡民工——马虎不注意,把他睡在高楼层边缘的网袋的一根绳子偷偷解开。马虎坠楼死后,安叔魂不守舍,老是幻觉马虎的冤魂在纠缠自己。马虎的老婆来处理事后时,据马虎的家信向安叔追问其所得的1万块工钱,安叔终于崩溃并投案自首。后来峰回路转,安叔其实无需担责。马虎的死是他自己设计的。当马虎得知自己患上癌症后,决定用自己的身体赚取最后一笔钱——安葬费。安叔因贫穷而走向邪路(几乎没有任何家产,老婆跟别人过日子,最后还因负担不起儿子高昂的学费而让儿子改姓别人的姓氏),但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尚未充分领教世界尔虞我诈之残酷的老实人,其人性还未被连根拔起,他心底还存有一份柔软的人间之情。马虎坠死本已使安叔惴惴然,而老板狠心沉尸于池塘更让安叔于心不忍:马虎已经死得够惨了,死后却又无“出头”之日,无法魂归故里。当安叔去把警察领来指认抛尸之处的时候,是乡村的伦理和信仰促使他走上重新找回自己灵魂的路。

这一底层故事很好地表现了一个奔向“现代生活”的农民,在物欲、良知和伦理信仰三个层面上的心理矛盾冲突。在里面,我们读到了一个富有层次的内心世界,看到了人性在物欲诱惑与伦理信仰之间的迷惘、奔突和复归。

在《雪越来越暖》中,主人公杨凤莲的命运不仅展现了弱势女性群体在当代的残酷遭遇,也表现了传统伦理道德对人性的囚牢。杨凤莲进城打工被裁缝店的老板诱骗并卖到西北的深山之中,几番挣扎之后最终委身于人。6年之后,已建立幸福家庭的杨凤莲带着一家人回到故乡。然而一切早已面目全非,父亲外出寻找女儿时被人谋财害命,母亲变得衰老不堪,失去支柱后家庭一贫如洗,而弟弟经历了家庭巨变之后则变得心灰意冷、不务正业,也因此讨不上媳妇。内疚的杨凤莲让丈夫独自带女儿回西北,自己留在家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母亲临死前,杨凤莲答应母亲成全弟弟以让杨家延续香火,她以自己作为交换物,嫁给一个姓郝的瞎子,而瞎子的妹妹则嫁给自己的弟弟。然而日子并不平静,弟媳不堪忍受非人的生活而要远走高飞,却被弟弟打死,杨凤莲在郝家活得更加艰难,简直猪狗不如。她最终认清了自己方向,敢于甩开自己背上的那一个沉重的伦理包袱,迈向了新的人生。

从杨凤莲的身上我们看到中国广大乡村妇女的真实困境。“个性的解放”、“人的尊严与价值”、“平等与自由”等价值观念,自“五四”时代起就已大张旗鼓地宣扬,可一百年过去了,这些价值观还依然很难在广大农村地区存活与根植,女人依然仅仅被视为性工具、生育工

具、交换的等价物等等。杨凤莲在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下,把自己囚进了非人的生活牢笼。她果断而冷静地把丈夫和女儿赶回北方,麻木地任由郝瞎子指派和侮辱,无不显示了传统伦理道德对个体的强大钳制。

底层大众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划出了不同的轨迹。《擦鞋的女人》中下岗女工方玉萍经历了从混沌到挣扎到觉醒的过程,最终勇于向“上层官僚”诉求公平和公正。通过公平的方式(抽签),方玉萍获得了排在死胡同入口处的第一个位置,擦鞋生意红火。后来她发现她们四个以擦鞋为生的女人背后都隐藏了不同寻常的苦难,于是她们在相互体谅中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公平与互助(轮流坐在第一个位置上)。小说不乏尖锐的社会内容,也不乏人性的温馨,但作者更注重挖掘下岗工人心理与意识的变化(即政治经济权利意识从淡漠到觉醒),而这种变化其实就是底层大众向时代变革提出的诉求。《温泉宾馆》的农村女孩小菱为改变自己命运到温泉宾馆打工,却遭遇了种种无奈,她纯洁而幼稚的献身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小菱所持的传统观念在现代欲望游戏中是多么的脆弱和不合时宜!小说展现了传统伦理道德在官能社会中的崩溃。

欲望的膨胀、人性的挣扎、伦理的悖谬、良知的叩问、现代意识的觉醒等构成了周末小说的深刻意蕴。这些小说不仅立体地体现了底层复杂的思想性格和文化心理,而且相当成功地把地方性因素(边地风俗人情与人生)和当代性融合起来,从而获得了较高的审美价值。

周末的创作并不是一个特例。可以说,民族作家的底层叙事是丰富多彩的。“底层文学”理论批评不应忽视民族作家的底层书写经验,这些经验可为底层叙事的深化提供诸多有益的东西。

(潘文峰,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广西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周 翔】